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魏崇辉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生成性概念,需从新时代的话语语境、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生产要素的多样性等层面把握其基本意涵。新质生产力的出场与我们党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战略层面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政策层面上,发挥政府引导、市场调整在科研立项中的共同作用;坚持研发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决定的协同攻关体制;坚持政府保障、市场评估以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在具体实施上,围绕重大科技工程,引领产业发展;建好科技产业园区,发挥集聚效应;立足本地优势资源,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谋划未来产业。

关键词: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驱动

202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9 月 8 日,习近平再次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这不仅为新时代东北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推动生产力跃迁明晰了发展方向,进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重要指导意义。

“生产力”这一概念由来已久。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生产力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养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科技水平提高带动产业结构剧变,为新质生产力提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9JZD009)。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供了实践支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理论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实践上指导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在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整合”“引领”“培育”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概念线索。过去通常将科技要素看作是先进的制造工艺和生产设备等实体形态,是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如今科技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愈发紧密,渗透于生产各环节,逐渐成为生产过程的“灵魂”。新质生产力之“新”,就在于科技创新,不仅是科技本身创新,更是以科技来创新生产。“整合”,就是要组织起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协同攻关科技难题。“引领”,就是要发挥科技在各要素中的核心作用,引领劳动者、制造设备、管理方式等要素全面升级。“培育”,就是要加快科研成果向实际效益的转化,以科技赋能产业全过程,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

从词源学上看,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是“生产力”,“新质”则是这种生产力的修饰语。所谓“新质”,就是在质态、本质上,这一生产力与“旧”的传统生产力有所区别,在驱动方式上不同。而定性是“生产力”,就是说这一生产力要应用到现实的生产中去,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这一内涵凸显了它具有科技创新作为内生动力和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根本旨归两大特点。在简要厘清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领悟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还须结合其提出时的语境、马恩对生产力概念的经典表述以及生产要素的多样性。

(一)从新时代的话语语境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时提出的,在两次表述中都强调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说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经过充分酝酿,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密切联系。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提出的。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领了一轮产业变革,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在这一变局中扮演着“推动者”的身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推动世界政治格局深刻转变。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颠覆性技术突破,正在酝酿诞生一批未来产业;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动多领域技术融合创新;新兴科技不断赋能传统产业,机械工程、服装设计、汽车制造等行业焕发新的生机,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新科技催生新产业,新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这是新质生产力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具体表现。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结合东北地区的现实产业布局 and 战略地位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长子”,产业结构一直都是以重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是我国重要的

重工业基地,在国防安全、能源供给、机械制造等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新兴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东北地区传统重工业单一的生产结构和单纯依靠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未能得到及时改善,加之石油、矿产等资源日渐枯竭,东北地区逐渐被其他地区拉开差距,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成为东北地区的迫切任务。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引起了传统产业的深刻变革。传统产业是以传统能源为动力,以传统的生产方式为主体的,新质生产力则为传统工业更换了动力引擎和作业载体,从而实现产业形态上的升级,这正是适合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模式。正如习近平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3],是结合东北产业已有优势和现实困境提出的,对东北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在擘画我国高质量发展未来蓝图过程中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跃升至世界第二,初步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十年来,我国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安徽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升为首位产业,江苏围绕生产母机、生物医药等项目进行技术攻关,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带动湖北制造业迈上新台阶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提供了强劲的经济动能。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任务繁重,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等。

(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学理渊源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仍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生产力思想受斯密、李嘉图的“劳动生产力”和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影响,使用他们定义的生产力概念。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向历史唯物主义者转变,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哲学上的阐释。撰写《哲学的贫困》时,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表述,构建起体系化的生产力理论。此后,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政治经济学上的补充。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提出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中有其理论渊源。

第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探寻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这一经济学范畴放在了唯物史观的视域下进行研究,从而赋予了它鲜明的哲学色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历史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这指明了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实际需求的物质生产力量,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而且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哲学

的贫困》中廓清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5]此外,在揭示生产力概念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还包括劳动者:“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6]进一步拓宽了生产力的内涵,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的论述中,至少可以总结出三点新质生产力诞生的逻辑基础:(1)新质生产力作为塑造经济新动能的强大物质力量,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而提出的;(2)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伴随并要求生产关系的重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生产模式正是超越传统生产关系的体现;(3)生产力的组成要素复杂,新质生产力要求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其中包含科技、人才、数据、信息、管理等多个要素。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探寻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后,对科技与资本相结合产生巨大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作了详细的阐释,为新质生产力的塑造提供了依循。首先,马克思对科技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过程作了说明。18世纪70年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西欧国家完成了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7]易言之,科技作为知识形态的存在物,也可以成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8],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其次,马克思揭示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组成要素具体产生效益的方式。一方面,科技作为劳动资料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如制造工艺或效率的提高,“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9]。另一方面,科技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在产业融合、资源聚集等方面发挥作用,“不变资本便宜化的其他方式建立在发明的基础上……是由把这些不变资本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些生产领域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所造成的便宜化”^[10]。再次,通过对科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异化的阐述,马克思指出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带有社会制度的印记。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的逐利性使科技“在一定时期内快速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1]。二是劳动者的异化。机器大工业使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2],丧失了主体性地位。三是科技自身的异化。“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13],不再朝着社会需要的方向进步。从此论述中同样可以总结出至少三点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1)科技与生产过程结合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2)科技与生产结合方式多样,要求着眼生产全过程,整合好科技创新资源;(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要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三)从生产要素的多样性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内在提出了生产力组成要素的多样性。在细致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后,马克思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4]、“社会生产力”^[15]、科学生产力^[16]、自然生产力^[17]等,这些表述内在扩充了生产力概念的范畴,构建起多维度的生产力体

系。进一步地,马克思说明了这种多维度生产力概念的由来。如对于自然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18]生产力是结构复杂的系统,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自然、管理、科技等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这被学者总结为生产力的两种生产要素理论,即一种是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另一种是渗透性要素,包括科学技术、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牢牢把握当下生产力组成要素中的活跃成分,将一切积极因素与国家发展全局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产要素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提供了思路。2014年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1],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概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产力概念;2022年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22],“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23],强调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独特作用;2018年在全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发挥互联网作为新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数据、信息、知识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24],提出了三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生产力的现实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6],阐明了当下生产力组成要素的丰富多样。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根植于生产力要素的多样性。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质态的新,而质态取决于在生产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各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科学生产力”等概念,它强调的并不是某种单一的生产要素,而是要突出其中“新”生产要素对旧生产要素的超越。因何而新?科技创新是关键。但新质生产力又不仅仅指代科技生产力,它有更丰富的内涵。科技生产力强调的是,相较于其他要素,科技这一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起更主要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以科技为引领,全面推动各生产要素的创新,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力的跃迁。如上文所说,科技已经不再作为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深刻融入其中每一具体环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生产过程中,从实体性要素——高素质劳动者、高效生产设备、优质加工材料,到其他渗透性要素——组织、管理、知识,再到新型生产要素——数据、信息等,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组织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生产过程中一切要素组织起来,实现产业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跃迁。

二、新质生产力的演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生产力范畴的认识,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夯实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实践支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我国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回顾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科技事业的政策,并总结我们党利用科技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经验,对当前各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一) 生产力中科技作用的凸显(1949—1977年)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我国工业化建设时,内在地提出了利用科技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一穷二白,国防、经济、民生各领域百废待兴。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7]表明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科技在经济建设上的重要性。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会议上指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8]同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更是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9],将科技进一步拔高到提高生产力的高度。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组织规划全国科研工作,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现实问题。1956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我们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开始着手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总体思路,把“以任务带学科”^[30]作为主要的原则,以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科技任务带动学科发展。为保证“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实施,我们党构建了具有“大科学”特征的国家科技体制。要“集中力量,把各方面的力量统统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来完成国家任务”^[31]。我们党组建了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动员国家各方面力量来完成重大科研任务,在“两弹一星”等工程上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科技事业政策呈现出鲜明的现实目标导向,科技体制具有高度集中和充分计划的特征,为当前我国在塑造新质生产力中党和政府发挥领导作用提供思路。此时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主要在实体形态上,强调其作为工具的“应用性”。

(二) 生产力的内涵丰富及其实践推动(1978—2011年)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将科学技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早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时,他就以巨大的政治勇

气提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32]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33]并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入手,说明科技是作为知识形态通过与二者的深度融合而成为生产力的。这表明我们党对科技的理解更加深入,看到了知识形态的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他指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34]他认为,发展科技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科技提高到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重要范畴的高度,提高了科研工作者的地位,认为从事科研工作就是从事生产,指出科学技术队伍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8年,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后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一步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35]这里的“第一”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前瞻性地包含了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内在逻辑:(1)科技作为生产力的组成要素,日渐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科技与生产的结合日益紧密,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速度大幅提高;(3)科技对生产活动具有引领作用,科研的突破能带动产业发展。

为落实邓小平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对科技体制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以促进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1981年,国家科委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其主要内容最终形成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36]的指导方针,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具体而言,优化拨款制度,以国家拨款、项目申请、自主筹措等形式增加科研经费来源;畅通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渠道,开拓科技市场;调整组织架构,促进产研一体化发展;部署科研纵深配置,加强应用研究,重视基础研究等。从中不难看出,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推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以科技引领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务院相继推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文件,更加突出了科研生产联合的方针。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指令性计划,如“863计划”、“97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形成了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推动高技术产业化和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来实现科技向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转化。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2001年,在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37]阐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内在联系。此外,江泽民特别重视教育与人才等资源对科技的支撑作用,在199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他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38],更为广泛地整合科技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江泽民将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推向了新世纪,进一步探析了科技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关联。

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胡锦涛尤其重视创新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全球性竞争压力,他指出要靠科技创新突破发展困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摆到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39]。201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拟定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七个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此外,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基础上,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强调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

这一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和生产力学说上的突破,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再到重视自主创新与人才资源,我们党将这一理论层层推进,为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实践上,我国科技体制愈发完善,科技水平突飞猛进,新兴产业日渐成熟,为新质生产力的出场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的出场(2012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深刻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科研规律,针对我国经济情况和科技事业面前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着力加强创新创业创造,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培育壮大到引领发展的跃升。新质生产力呼之欲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40]将科技创新在今后工作中的地位提到了新高度。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41]，“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42]。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揭示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43],扩充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其背后逻辑在于几十年间世情国情的转变,更加突出了创新在当下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44]。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再提“科技自立自强”,并为其加上“高水平”^[45]前缀,说明了科技创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在2020年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将先前提出的“三个面向”扩充为“四个面向”,指出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46],指明了科技创新的价值导向。2023年7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47],这是对“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8]的重大创新,强调科技创新在发展方方面面的关键作用。

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飞速发展,成功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贡献日益显现。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达45个,集群产值超20万亿元^[49]。这些成就与出台的一系列科技政策密不可分。2015年

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凸显了改革从科技体制扩大到经济体制的鲜明导向。发布于2016年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实现发展方式、发展要素、产业分工、创新能力、资源配置、创新群体的“六个转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技政策作为七大政策之一提出,强调科技部门要对经济发展如培育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等负责。具体到新产业,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梳理了新兴产业分类标准,部署实施21项重大工程,超前布局了未来产业。2023年8月发布的《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化发展做出系统安排,对于两者聚焦领域做出明确界定,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可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的地位摆得越来越高,与我国发展全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关于新产业的政策越来越细化。基于这些理论和实践基础的铺垫,新质生产力得以产生。

三、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政策与抓手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组织、管理、制度等因素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上文分析新质生产力中蕴含要素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正是整合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的自然逻辑基础。回顾我国关于利用科技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演变为探索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寻觅历史经验。立足于上文两部分的分析,本文将依次从宏观战略、政策、抓手三个层次对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给出建议。

(一) 战略定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50],这一论述是意蕴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方针。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提出并深入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为塑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战略性支撑。

第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就是为了通过重视教育来增强科技实力及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能力。当前实施这一战略,更要注重系统观念,将教育、人才、科技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谋篇布局教育事业,坚持“把稳中心,顾好两头”。把稳中心,就是要坚持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这一中心方法论。教育要切实转化为生产力,就要在培养过程中与生产深度融合。地方政府应牵头组织学校和企业拟定长期培养协议,特别是要着重与当地新兴产业开展合作。顾好两头,就是一方面要培养好行业尖端人才,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一般劳动者素质。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员工构成中,承担研发任务的尖端创新人才固然是引领行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整个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具备一定技术素养的一般劳动者运转。我国在高校培养尖端创新人才上卓有成效,近年来的青年领军人物已经逐渐成为科

研的中间力量,但在中等专科和高等专科院校的人才培养上则略有不足。要重视专科学校的教学质量,增设前沿产业的相关课程,地方上要安排专科学院与本地新兴产业开展联合培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基础性人才支撑。

第二,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聚焦人才从参与工作到产出成果的全过程,以服务人才为引导,深化人才发展各环节体制机制改革。首先,深化人才引进机制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要求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宏大格局。要增强科研工作者在人才引进中的话语权,形成“人才引进人才”“人才推荐人才”的良好局面。发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对人才特别是海外尖端人才的吸引力,争取“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51]。其次,深化人才发展机制改革。深刻领悟党管人才原则的真正内涵,将其与行政化的科研体制区别开来。党管人才重点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并不是要包揽人才工作的各方面。一方面,要下放一定权力给科研人员,使其在科研项目上能按照研发规律自主调配项目资金、人员流动等。另一方面,选配行业内管理人员专职行政,尽量避免让在研人员参与行政事务。再一方面,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在职称评定、荣誉评定、项目评审等评价体系各方面,要进一步清理唯论文、唯课题、唯职称、唯资历、唯奖项的情况。特别是在应用研究人才评价上,要突出成果导向,以评价制度为“指挥棒”,推动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使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

第三,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关于科技引领发展的重大战略,相较于先前提出的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它在谋篇布局上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在动力选择上更强调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十分宏大的工程,内涵极为丰富,要发挥好这一工程对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在国家层面,加强基础研究支持。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前瞻性布局的优势,为培育未来产业打下坚实基础;在社会层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服务体系;在个体层面,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体制,塑造创新创业社会风气;在制度层面,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特别是科技与经济相关制度,如科研资金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和转让制度、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等。总之,就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目的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

(二)政策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握时代潮流、尊重经济规律、结合中心任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相应政策来推动科技事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跃升。从过去的举国体制到如今的新型举国体制,我们探索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论,将其应用到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全过程,能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

首先,在科研立项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科研项目的选择种类多样,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长期研究或短期研究,本质上在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有的项目研发周期长,收益难以短期见效;有的项目难度较小,收益却相对可观;有的项目收益不明显,属于利于

公众的“隐性”收益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投入研发资金的主体,但如果任由市场调节科技资源的配置,那么一些基础研究,或带有福利性质的科研项目就得不到充足的资源,最终导致科技创新的后劲不足。同样若完全依靠政府来分配科技资源拟定研发项目,那将压制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具体到地方,地方政府属于行为个体,在科技事业上也有逐利性,如果只为本地发展或是追求科技“政绩”而违背经济规律强制推行科技项目,将会打乱科技要素市场,降低创新效率。因此,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政府通过制定针对性政策引导科研方向,特别是对于收益见效慢的基础研究,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资源倾斜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但同时应当坚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市场活力,不可过度干预,要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在研发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决定的协同攻关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中强调“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攻关模式,实际上,这一模式不仅在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对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重要借鉴价值。“举国”强调的是在政府组织下,社会各界多元主体都参与到研发中来,形成协同合力;“新型”则强调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如今更注重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产学研”不会自发形成有机整体,归根结底,只有客观上市场需要,“产学研”才有一体发展的内在动力。政府在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就是通过制定现实政策具现这一趋势,在市场决定的前提下,以外力加速多元主体的联合,为结成“政产学研”创新联盟提供服务。第一,政府要搭建对话平台,为“产学研”各创新主体合作提供契机;第二,要积极充当连接各创新主体的纽带,根据不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长主动牵线搭桥,引导协同创新的方向;第三,要协调好各创新主体之间人员调动、资金流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关系,发挥“压舱石”作用。

最后,在成果转化时,坚持政府保障、市场评估以畅通渠道。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2022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企业为48.1%,科研单位为13.3%,高校仅为3.9%^[52],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既是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原因,也是阻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痛点。究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不能转。此问题与科研项目本身有关,主要在于没有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所做研究产生不了实际经济价值。二是不想转。部分研究人员重理论而轻应用,对成果转化缺乏积极性。三是不会转。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便是部分小微企业,也会知难而退。四是不敢转。部分研究领域成果转化的配套措施暂时空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使研究人员担心成果流失^[53]。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发挥职能提供保障:一是落实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知识产权转移程序制度等政策;二是以政府信用背书,联系有能力转化科研成果的企业对接高校和科研院所;三是为有意愿转化科研成果的单位提供相关服务,协助其熟悉流程;四是组织领域内专业人士对现有科研成果进行评估,评估标准取决于市场调研结果,结果优秀的推动其转化,结果不合格的提出意见建议。

(三)具体实施

塑造新质生产力,习近平作出的重要论述为其指明大方向,中央和地方出台政策、优化体

制为其提供支撑保障,最终要落实到现实的产业构建中去,还需要一系列具体措施。各地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抓手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首先,围绕重大科技工程,引领产业发展。一项重大科技工程的落地,不仅要求对科学原理的高度掌握,而且要求背后有全面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以质促效,助力于中国式现代化^[54]。如国产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有532家配套单位参与了研发过程,其中非军工的社会单位达412家^[55],航母甲板对强度的要求推动特种钢技术的突破,雷达通讯设备带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电磁弹射技术的突破倒推民用电池储能技术的升级等。再如海南“深海一号”生产储油平台、贵州“天眼”射电望远镜、安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从设备材料到制造工艺,从数据处理到智能控制,由内而外的各个生产环节,推动了上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面进步。各地政府要结合当地资源和区位优势,主动申办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重大科技工程,将其作为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建设重大科技工程的过程中,构建本地特色新兴产业为其服务;在工程取得成果后,推动高水平科技转为民用实现量产,反哺相关产业。

其次,建好科技产业园区,发挥集聚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下,我国各地涌现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园,日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例如上海张江科学城,2022年规上工业总产值3702亿元,占上海比重9.1%,在上海总体规上工业产值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6.1%的增长率^[56],体现出新兴产业的强劲动力;苏州工业园区,2022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6850.2亿元,比上年增长7.0%,其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达到58.5%和74.8%^[57]。科技产业园区的成功在于其空间上的“集聚效应”:一是基础设施共同使用,生产高效。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基础设施需求上较为相似,如大量电能供应,高密度覆盖的5G基站等,建设园区有利于集中供应,提高效率节省成本。二是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更为便利。当今科技发展呈现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推动产业园区中数字信息、化学工程、能源动力等不同领域的新兴产业彼此相近,更易互相赋能形成“1+1>2”的叠加效应。三是产学研一体化,科技成果转化畅通。园区将高校、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汇聚一地,打造从基础研究、应用试验、投入量产到价值产出的完整链条,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就地转化。

再次,立足本地优势资源,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谋划未来产业。因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我国各地区在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体系。如东北地区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建立起重工业基地,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良好的水运条件发展起远洋船舶制造业等。再细化到省市乃至乡镇,各地区都有本地的支柱产业,如河南省土地平旷,农业发达;酒泉市依靠航天工程,建立起配套的航天产业。当地政府要立足本地已有优势产业,运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进行赋能,在项目规划、生产运营、检修维护各环节实现效率和质量上的升级,让传统产业再度焕发新的活力,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跃迁。高水平大学是各地宝贵的科技创新资源,各地政府要围绕高校特长专业发展相关产业。例如,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拥有电子信息工程、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国家特色专业和一系列

学科评估为 A + 的专业,安徽充分发挥这一资源优势,围绕中国科大建设“科大硅谷”,已在量子信息、核聚变、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计划将其打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和未来产业诞生地^[58]。

〔参考文献〕

[1][3]《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10 日。

[2]《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9 日。

[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58、254、274 页。

[7][8][9][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2、102、102、100—101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21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79—580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142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76 页。

[15][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95、366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331—332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122 页。

[19]黄顺基、郭贵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47 页。

[20][21]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63、62 页。

[22][23][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 217、219、196 页。

[24]《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 136 页。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0 页。

[26][5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28、33 页。

[2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38 页。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60 页。

[2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51 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 37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42 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 36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18 页。

[32][33][34][4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4、87、87、86 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5 页。

[3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模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39 页。

[37]《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75 页。

[38]《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28 页。

- [39]《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98 页。
- [4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1 页。
- [41][42]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0、10 页。
- [43]《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路》,《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6 日。
- [4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 12 页。
- [46]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 4 页。
- [47]《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8 日。
- [4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 13%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产值超 20 万亿元》,《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6 日。
- [51]何毅亭:《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24 页。
- [52]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2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12/28/art_88_181043.html,2023 年 10 月 27 日。
- [53]李三希、武珂璠、李嘉琦:《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时代意义、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
- [54]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
- [55]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首艘国产航母开始动力系统测试》,2017 年 8 月 4 日,<https://www.sastind.gov.cn/n10086200/n10086344/c10190729/content.html>,2023 年 10 月 27 日。
- [56]《去年营收同比增 8.3%,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约占全市 2/3 张江科学城主要指标逆势上扬》,《解放日报》,2023 年 4 月 17 日。
- [57]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园区 2022 年经济数据正式公布》,2023 年 2 月 7 日,https://www.sipac.gov.cn/szgyyq/xhtml/sjxf_detail.html?id=84967,2023 年 10 月 27 日。
- [58]《安徽:“十四五”将“科大硅谷”打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2022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35291,2023 年 10 月 27 日。

责任编辑:唐 兵